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8月11日

文化视野

佛教中国化是成功的文化融合

□王皓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外来思想，无疑就是佛教。如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在《六朝佛教思想研究》中所揭示的，佛教与儒教相协调，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逐渐消除了对佛教的抵触情绪，同时获得了信奉儒教的统治者的认可。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方式有多种说法，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西汉末或东汉初，开始仅仅在王室皇族之间流传，东晋以后，信众扩展至士大夫和一般百姓。不过，随着士大夫阶层出现出家者，佛教开始被部分人视为社会问题，参照三国牟子《理惑论》可知，其攻击佛教最常见的观点，就是佛教的削发、出家不娶等做法违反了儒教伦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此类指责，佛教的信者也进行了反驳，其依据的也是儒教经典。

如依据《孝经》引出的论证，《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反对佛教的人常引用前半句说佛教与儒教伦理不容，而东晋孙绰则在《喻道论》之中强调说，佛教能让人"立身行道"，这才是最大的孝。

不仅如此，佛教信者进一步指出，出家者救济、教化众生，这与帝王的政治任务是相同的。东晋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之中就认为，佛教的出家人救济处于流转之底的世俗之人，断绝其业根，广开天上和人间的转生之路，即使一个出家者修得全德，其恩惠也会波及六亲甚至全天下，所以出家者即便不处王侯之位，其道与帝王治世之道也是一致的。他在答复何无忌对于《袒服论》的质疑之中说，佛教与儒教，释迦与周公旦、孔子在立教的方法上虽然有区别，但有潜在的相互影响，虽然有超俗和在俗的区别，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最终目的，就是救济人民。

在救济人民方面，孔子所说的仁和佛教所说的慈悲具有共通之处。《修行本起经》卷上中出现了"能仁菩萨"的译语，说能仁菩萨"慈悲喜护，惠施仁爱"，同时使用原本属于儒教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后汉书》卷四十二记载了后汉明帝在永平八年（65年）给楚王英的诏书，其中有著名的一句话："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文中，楚王英信奉佛教的方式为"尚浮屠之仁祠"，这也是因为将佛陀的作为理解为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孟子·尽心上》之中为人熟知的名言，也集中体现了儒教仁爱观所蕴含的兼济精神。由于佛教将慈悲与仁爱相结合，所以中国的僧人们倾向于救济一切众生，将其作为佛教的慈悲精神。这对中国佛教最大的改变就是，让追求救度一切众生的大乘佛教成为了汉传佛教的主流。

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入关之前，中国的佛家尚不能清楚区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所以郗超、孙绰、释道安、庐山慧远等佛家提出救济一切众生才是佛陀的慈悲，是因为其符合儒家所说的仁。其他的罗什入关之前的佛家也都一样，如孙绰的《喻道论》之中，说佛教"弘道敷仁，广济群生"，认为佛教救济众生是在敷仁。

而鸠摩罗什则明确告诉弟子们，一切众生的救济是大乘，追求自身解脱的是小乘。其弟子竺道生在《妙法莲华经疏》序品的注中指出，小乘的声闻仅以消灭自身之苦为目的，而大乘的菩萨之道发菩提心，以此涵盖一切，不以去除自身的烦恼为目的，而专注于救济一切众生之道。

后秦文桓帝姚兴广求人才，要求沙门道恒和道标还俗，他在书简之中说："劝弘菩萨兼济之道。"这也表明，姚兴认为置身世俗并致力于救济一切众生（即兼济）才是大乘的菩萨道。姚兴还说道恒和道标这样的出家人是"潜独善之地"。可以说，姚兴结合了佛教救济一切众生的大乘主义和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佛教信者还是非信者，在看待大小乘佛教之时，都受到了儒教价值观的影响。

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并形成了众多的宗派。特别是在隋唐之后，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更是中国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吸收了儒、道思想的教派，佛教和儒教的融合以更直接的形式表现。如，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吉藏法师在《仁王般若经疏》卷一之中，就将佛教的五戒与儒教的五常对应，认为不杀生为仁，不盗窃为智，不淫为义，不饮酒为礼，不说谎为信。甚至，南宋孝宗赵昚著《原道论》，也认为："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远乎。"认为佛陀与孔子的教导是一致的。

佛教积极兼容儒教，同时又保持了极高的理论水平，这让一些士大夫对儒教的地位产生了危机感，创作《原道》的韩愈就是其代表。同时，佛教也出现了不少支持儒教的代表人物，如北宋著名禅师契嵩、天台宗学者智圆等，很多人既是佛教信者，也是儒士。

如上所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佛教信者并没有排斥传统的儒教思想，而是希望调和儒教和佛教之间的矛盾。

一开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比较多元，经典的翻译也比较零散，且不成完整体系。而且中、印的文化背景差别很大，轮回、业、劫等佛教基本概念在印度是司空见惯的，而中国则完全没有，经典翻译的过程就引入了中国传统概念。甚至，还采取过格义的方式解说佛教教理。牟子引用儒家经典和老庄思想向儒士解释佛教，理由就是"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这样来看，似乎佛教走向中国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信奉佛教的中国人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希望通过中国化，特别是与儒教融合，以减少社会和政权对佛教的抵触。荷兰汉学家许里和有一部名为《佛教征服中国》的著作，不仅研究了佛教对中国的改变，更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所以，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征服"了佛教。从结果上看，佛教的中国化是成功的，让其在中国发展两千余年，虽然中间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等事件，但是总体而言是稳步发展，牢牢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

孔子"弋不射宿"的资源节用观

□任俊华

孔子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因而他对山中的鸟、水中的鱼都能持一种节用态度，反对乱捕乱杀。《论语·述而第七》记录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孔子捕鱼用钓竿而不用网，用带生丝的箭射鸟却不射杀巢宿的鸟。这里揭示了孔子的资源节用观。

我们知道，孔子生活的时代，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相当丰富的，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捕鱼狩猎是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孔子去河边钓鱼或去山上射鸟正是参加劳动、维持基本生活的表现，不存在今天说的捕杀野生动物问题。

为什么孔子主张用竹竿钓鱼不用绳网捕鱼，用带生丝的箭射鸟却不射杀巢宿的鸟？这是因为用绳网捕鱼可对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射杀巢宿的鸟也会大大小小一巢打尽。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会造成资源枯竭，也会阻塞老百姓的靠捕鱼狩猎为生的生存之道，是一种不仁的行径，所以孔子加以反对。当然，这种生态资源节用观也体现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而反对毁灭野生资源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对可再生资源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统治者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治理千乘之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欺，节用资源，爱护众人，用工不违农时。可见，敬事、诚信、节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畴，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作为"五美"（五种美德）之首，这表面上是对君子而言，实际上也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当然，孔子亦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因为饮食太饱势必多消费粮食，居住太舒适势必耗费过多的土地空间和建筑材料，这都是没有做到节用，故为君子所不取。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因为节约而犯过错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他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奢侈就显得不恭顺，俭朴就显得简陋；与其不恭顺，宁可简陋。孔子主张节俭，反对奢侈，哪怕别人说自己简陋亦无妨。本来"礼"是儒家很看重的，但孔子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的主张，认为就一般的礼仪来说，与其奢侈浪费，宁可俭朴一些好。孔子讲节用俭朴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讲，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据《论语·子罕第九》记载，一次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赞扬自己那位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好注脚。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君子人格，不追求外在的生活奢侈、豪华气派。因为他自己出身贫贱，知道民众疾苦，他讲"俭，吾从众"，既然大家都这样俭省，我也应该跟大家一样节俭，这说明孔子的确是一个节俭意识很强的思想家。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减少民众疾苦，维持日常生活，以及对生态资源保护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今天，虽然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生态节用消费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这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生态伦理规范。我们说当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与人类自身过多地追求高消费，不注意节用，是有直接关系的。想想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生态消费理念，这岂不也是"乐亦在其中"的事情吗？

珂勒惠支与两次世界大战

□金海民

1936年1月，鲁迅对德国女版画家、雕塑家凯绥·珂勒惠支（1867—1945年）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

鲁迅只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珂勒惠支则忍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加给她的痛苦。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在战争爆发后不到3个月，在当年的10月22日，珂勒惠支的18岁小儿子彼得，在未经任何正式训练的情况下，无谓地牺牲在西线比利时西佛兰德地区的迪克斯迈德。1942年9月22日，她的大孙子彼得（为纪念叔叔，与之同名），在东线的苏联阵亡。

失去儿子和孙子后，珂勒惠支将她撕心裂肺的痛凝聚在可列入她最优秀作品的两件传世之作里。一件是花岗岩雕塑作品，另一件则是一幅石版画。

一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珂勒惠支就决定要创作一件雕塑作品纪念儿子。这件作品历经反复构思、创作、修改，在1932年——经过了与儿子在世等长的18年时间，终于在儿子埋葬的比利时土地上，树立起她的不朽之作。现今，前往比利时迪克斯迈德市弗拉兹洛德军士兵公墓的人，能看到女雕塑家名为《阵亡儿子的双亲》的这件作品：中年丧子的男女是那么伤心——他们采取跪姿。女的闭着眼睛，弯着腰、弓着背，做祷告状；而男的则双手交叉，手掌分别搭在腰间和手臂上，身体则挺得笔直……当时，珂勒惠支夫妇都到了现场。他们先站在两个塑像前沉思，而后走到儿子的墓前，再回到他们两人本人的花岗岩雕像前，珂勒惠支注视着她的艺术作品——她本人的石头面孔，又不由得抚摩自己的脸——她哭了起来！

及至孙子彼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珂勒惠支已经没有了那么多对作品酝酿、构思、琢磨的时间，为此而作的是一幅石版画《莫将麦种碾成面粉》。在画中，一个母亲伸出双手，在怀抱中护卫着三个孩子——我们知道，珂勒惠支的大儿子汉斯有四个孩子，在大孙子死后，就剩下两个孙女和小孙子了。

珂勒惠支出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从小就显露出绘画的天才，先后在该城、柏林和慕尼黑学画。1891年，与医生卡尔·珂勒惠支结婚，婚后，搬至柏林的贫民区普伦茨劳贝格，她的丈夫在那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里，他们生活了50多年。在那里，他们的两个儿子汉斯与彼得在一天天成长。在那里，珂勒惠支日复一日亲眼目睹了贫穷就诊者的痛苦、挣扎和抗争。在那里，随着愈来愈多的艺术创作问世，她的名气也愈来愈大。她的成名作是连续故事铜版画《织工暴动》六幅和《农民战争》七幅。她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而到了纳粹时期，她被褫夺了院士的名号。鲁迅亲自操持出版的前面提到的版画集，按鲁迅的意思，也是对女艺术家70诞辰的一个纪念。然而在德国，纳粹禁止为庆祝珂勒惠支70寿辰画展的举办。

1943年11月，珂勒惠支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的住所遭轰炸被毁之一炬——她一生中的大部分艺术作品毁于一旦。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她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和她大部分的艺术产儿。

幸运的是，在遭轰炸的日子，珂勒惠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在图林根的家里，逃过了一劫。1944年7月20日，她迁往德累斯顿附近的莫里茨堡，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前夕，珂勒惠支在那里于1945年4月22日逝世。

文化长廊

民国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

□陈　远

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必须提及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其中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以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两支虽非民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为民国教育的两翼。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先生。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洋公学爆发学潮，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东女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开始了职业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还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1912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1920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

回到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张謇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

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订立："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代表。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说完中华职业教育社，再来说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说起平促会，则不能不说到晏阳初。让我们回到1943年5月24日晚的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那里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正在举行。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

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20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和平促会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陶行知和晓庄师范学校

在晏阳初发起全民识字运动的同时，同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陶知行）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1926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初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他的理想是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投身教育，受到了强大的时代因素的影响。早在1914年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投身教育的思想和志向。

他远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毕业时，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回国投身教育。他在归国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们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1927年元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在晓庄师范最初的招生广告上明确写清了这所学校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在两个月之后的开学典礼上，作为校长的陶行知在致辞中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陶行知的教育目标，是要建"一个有生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每天早晨5时有一个10到15分钟的全校短会，师生轮流主持。先唱陶行知填词的校歌《锄头舞歌》，继而安排当日的学习和工作，会后是早操。上午主要是读书，书目一部分由学校指定，一部分个人自选。下午是工作时间，内容有田间劳动、简单的工艺制作、校外社会实践等。晚上是平民夜校活动等。用陶行知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是"打破装饰品的教育"。

顺便说一下，创办晓庄学校的陶行知，既是中华职业教育最早的发起人，也是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这也从侧面说明，看似"一盘散沙"的民国教育并非毫无体系，反倒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干涉，教育保有独立，才有了如此多元丰富的格局，各个阶层，各类人才，只要有向学之心，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问学的场所所在。

教育历史